

202160



# 批判右派分子潘序倫 在會計方面的反动言行



552  
3612

上海財政經濟出版社

千  
千  
千



定 价：0.19 元

批判右派分子潘序倫  
在會計方面的反动言行

上海財政經濟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上海

**批判右派分子潘序倫  
在會計方面的反动言行**

\*

上海財政經濟出版社編輯、出版

(上海興興路54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91號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公厘 1/32 印張2 3/16 字數42,000

1958年10月第1版 195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500

定 价：(6) 0.19 元

## 編者的話

在反右派斗争中，各种形形色色的右派分子被广大的群众揭发出来。潘序伦就是这些被揭发的右派分子中非常恶劣的一个。

解放前，潘序伦与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勾结一起，并以巧取豪夺的手段，创设和发展了他的“立信事业”——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立信会计学校和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并以此为政治资本，爬上国民党经济部次长的职位，积极参与了反动统治的许多活动。解放后，潘序伦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假借从事写作为由，一方面不肯出来为人民服务，以表示他始终效忠于反动政权，另一方面就在他所写的书本中，大量散布反动谬论。去年整风运动开始以后，潘序伦认为他所妄想的资本主义复辟的时机已到，不断地在政协上海市委员会和民盟各次会议上，以及其他许多场合，猖狂地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进攻。

关于右派分子潘序伦的反动罪行，政协上海市委员会已经在去年八、九月间举行过多次座谈会，进行揭发和批判。今年三、四月间，又继续举行座谈会，并邀请有关单位，对潘序伦在会计书本中所散布的反动论点，作进一步的批判。

潘序伦过去一贯积极贩卖资本主义反动会计学说；解放后，当全国广大财会工作者已经在轰轰烈烈的学习社会主义

會計理論的時候，潘序倫竟然玩弄手法，借學術研究為幌子，繼續其販私勾當，陰謀破壞社會主義會計，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為了讓廣大的讀者認識潘序倫的右派面目，徹底粉碎潘序倫在會計方面的反動謬論，我們根據政協上海市委員會在今年召開的座談會記錄中，選擇了九篇發言，匯編成冊。

本書著重在批判潘序倫的反動會計論點。因此，在匯編過程中，我們採取了摘錄的方式，而不是把每一篇的發言都全文加以轉載。

1958年8月

## 目 錄

編者的話

|                               |    |
|-------------------------------|----|
| 潘序倫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右派分子.....          | 1  |
| 以學術研究為借口，妄圖資本主義復辟.....        | 9  |
| 打着“會計是純技術”的幌子，否定會計核算的階級性..... | 21 |
| 宣揚資本主義會計，為資本主義制度辯護.....       | 25 |
| 污蔑和歪曲社會主義會計，反對社會主義制度.....     | 35 |
| 撕去潘序倫偽裝學者的外衣.....             | 55 |

## 潘序倫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右派分子

潘序倫乘着黨整風的機會，在1957年大鳴大放時期，向黨和人民施放了一系列的毒箭，猖狂地向黨和社會主義進攻。他反對社會主義改造，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反對蘇聯，反對黨的領導，妄想資本主義復辟。種種罪行，証明了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右派分子。

潘序倫之成為一個右派分子，絕不是偶然的。他不僅在大鳴大放時向黨猖狂進攻，而且在他過去所編的會計書籍中，在他平素的具体行動中，早已反映了他的右派觀點，並始終對社會主義制度抱敵視的態度，妄想資本主義復辟。因此他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是一貫的。

潘序倫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矛頭之一，是反對社會主義改造。

他叫囂“定息不是剝削”，企圖來混淆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界限，否定資產階級的兩面性，從而想達到對抗社會主義改造的目的。不僅如此，他還散播“勞動收入投資和響應政府號召的投資不是剝削”的謬論，來迷惑和挑撥某些認識模糊的人，企圖煽動他們來反抗改造。

縱觀潘序倫的一生，干的就是剝削的勾當，他不但自己極其刻薄地剝削別人，而且還忠心耿耿地為四大家族效勞，為帝國主義幫凶，來搜括和榨取勞動人民的血汗。“剝削”這兩個



字已經与潘序倫这个人难解难分，在潘序倫的每一个毛孔里都渗透着剝削。对于潘序倫这样一个渾身都浸透了剝削的人，他是要死拉住資本主义制度不肯放手的。“定息不是剝削”的謬論对潘序倫來說，絕不是潘序倫在听了右派分子章乃器的謬論以后才与之“一鼻孔出气”的。在潘序倫所編寫的會計書籍中，早已在唱这个調子了。他說：“利潤是產生于成品的銷售階段，而不產生于生產階段。”他的用心就是要企圖否認資產階級对工人階級的剝削关系，为資本主义的剝削制度以及为他自己的剝削勾当作辯护。

潘序倫叫囂說：“三反、五反运动打击和否定了資產階級的積極性。”潘序倫所說的資產階級積極性是什么呢？难道还不是指的剝削嗎？潘序倫是衷心拥护剝削制度的，他对于剝削制度不但有着血肉的联系，而且对于資本有着深厚的感情。在他的會計書籍中就充分反映了这种感情。他对于有些會計学的讀者看見“資本”二字表示头痛，他就感到憤憤不平。而且在他的會計書中一再提到他是衷心希望資本万世長存，永恒不滅。因此，他的抗拒社会主义改造是由于他的牢固的資產階級的反动本質。

为了达到他抗拒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潘序倫公然提出“合营企業不要公方代表”。更惡毒的是他把合营企業中的公私方代表比作一条蛇有兩個头，借以進行瘋狂的攻击。

潘序倫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矛头之二，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

由于潘序倫牢固地站在反动立場，他对于社会主义就有刻骨的仇恨。他在大鳴大放时期，对于社会主义制度進行了全

面的攻击，并企图从根本上來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他叫嚣“新社会沒有是非”，“新社会沒有言論自由”，“新社会沒有法制”，“资本主义工商業不会產生官僚主义，社会主义工商業必然會產生官僚主义”，以及“要統計因計劃而造成的損失”等謬論。他的目的顯然是企圖资本主义复辟。

解放初期，潘序倫曾經用高薪的办法來引誘國家下部离开國家机关，到他那里工作。有些同志要想到國家机关工作，他就想法加以阻止，并采用預付稿費的办法進行拉攏。潘序倫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千方百計地使这些人不要为人民服务，不要为社会主义服务；而为他效劳。他的用心就是要与社会主义对立，反对社会主义。

潘序倫不但在大鳴大放的时期叫嚣要統計因計劃錯誤而造成的損失，而且在他的會計書籍中，老早就對我們的計劃經濟大肆污蔑。我們知道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特征之一是計劃經濟，潘序倫的矛头直接指向計劃經濟，就是要通过反对計劃經濟來反对社会主义制度。

潘序倫还別有用心的在他的會計書本中对社会主义企業的性質加以污蔑和歪曲，叫嚣國營企業還有“業主”，叫嚣“國營企業只是基本上消滅了資本主与劳动者的对立关系”。顯然这是他对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最惡毒的攻击，也就是从根本上來詆毀社会主义經濟。

潘序倫竭力宣揚资本主义會計和敌視社会主义會計。当然他之所以要宣揚资本主义會計，敌視社会主义會計，目的还是在于通过會計來維護资本主义制度和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潘序倫为了要替资本主义會計占領社会主义會計的陣地，就

打起一个“會計沒有階級性”的幌子，一面在書中大肆宣揚，一面又到处演講鼓吹。他之所以要打着这个幌子，是为了便于他販賣資本主義會計的私貨，并且企圖來改變社會主義會計的面貌，讓資本主義會計來占領陣地，從而來達到他反對社會主義制度，企圖回頭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目的。

潘序倫為了要搶奪社會主義會計陣地，他就利用他的出版機構立信會計圖書用品社，一方面故意推遲別人所翻譯的蘇聯會計著作的出版，不讓它與讀者早日見面；另一方面又將蘇聯著作中的內容故意加以歪曲篡改，用他自己編寫的形式出版，通過這樣來歪曲社會主義會計，來販賣資本主義的私貨。

潘序倫還利用他的立信會計圖書用品社來收買當時“新會計”雜誌的發行權，因為當時的“新會計”雜誌是一本介紹社會主義會計的刊物，他用盡心機去進行收買。他的目的就是要讓資本主義會計來占領這塊陣地。潘序倫企圖樹立資本主義會計陣地，與社會主義會計分庭抗禮，從而進一步進攻社會主義會計。這與右派分子陳振漢的企圖恢復資產階級經濟學，貶毀馬列主義經濟學，其用心完全是相同的。

由此可見，潘序倫不僅在大鳴大放的時候猖狂地攻擊社會主義制度，就是在這以前他也是一貫地反對社會主義的。

潘序倫的矛頭之三，是反對蘇聯。

潘序倫的反動立場是十分鮮明的，他一方面叫囂“美國生產力高，我們不要閉關自守”；另一方面他又污蔑社會主義陣營，說是“好象唱空城計”。在會計方面他也是牢固地站在他的反動立場，他一方面對資本主義會計推崇備至，說它是“豐富

多采”，并且还說我們應該“急起直追”；而另一方面对于社会主义會計，則竭力加以污蔑歪曲，說成是“空无所有”。他竭力貶低苏联會計的地位（將苏联會計述要作为补充讀物），阻撓苏联會計譯本的出版（祝百英等譯的苏联會計教程），抗拒翻譯苏联會計書籍（他1952年后已学会俄文，但坚决不翻譯）。所有这些，都是潘序倫在會計上反对苏联的具体表现。

潘序倫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矛头之四，是反对党的領導，妄想资本主义复辟。

潘序倫与其他右派分子一样，他們都知道要反对社会主义，就首先要反对共产党。

潘序倫要反对共产党，他把希望寄托在美蔣的复辟上，因此他就散播國際局势緊張的謬論。并污蔑周总理的國際形势报告是“空城計”；另一方面他却称道美國之音是“最可靠的消息”。

潘序倫的“变天”思想也是一貫的。

解放初期，潘序倫为了配合蔣介石叫囂的“三年反攻大陸”，在編寫會計書本方面，他也來一个“三年之計，兼述而不作之志”。于是他大量翻譯資本主义的會計書籍，妄想美蔣复辟以后，可以报功領賞。

后来潘序倫重新估計了形势，改变了他的策略，由“述而不作”轉变为“陸續改編”。在陸續改編的前一个階段，他就大量的編寫資本主义會計書籍，因为这样更有利于他散布资本主义會計毒素，巩固他的資本主义會計陣地。在潘序倫所寫的會計書籍中，从来不提共产党、人民政府等字句。更其荒謬的，連在政府會計中，他也不講人民政府；顯然他所提的政府是蔣

介石的政府。同时，他打着“會計沒有階級性”的幌子，向社会主义會計猖狂進攻。他一方面宣揚資本主义會計，另一方面又污蔑社会主义會計，企圖通过會計來反对社会主义制度。

所以从潘序倫編寫會計書籍方面，也証明了他一貫的“变天”思想。

根据我們上面的分析，潘序倫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是一貫的。去年大鳴大放时期，潘序倫的叫囂，是他右派面貌的徹底暴露。在这以前，在他的會計書籍中已經充分的反映了他的右派观点。他的行动也是一貫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             \*             \*

潘序倫進行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勾当，一向打着二塊招牌，二个幌子，那就是“不問政治”和“會計專家”。

潘序倫所以要打着“不問政治”的招牌，是为了更便利于他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實質上他是最热衷于反动政治活动的。在解放前，他与四大家族都有过勾搭，他經常在国民党的反动政府机关中担任伪职。直至爬上了伪經濟部次長。解放以后，他一直夢想美蔣复辟。人民政府一再邀他工作，他非但自己拒絕不干，还阻止別人为人民服务。解放前他忠心耿耿不遺余力为国民党反动立法效勞献策；解放后叫他参加刑法草案的討論，他却消極对抗，叫囂“新社会无法制”。解放前他办学校，請反动头子陈其采、王云五做董事長，他还迫害進步学生；而在解放后，他却陸續辞去校長职务，來和党对抗。从这些事实來看，潘序倫决不是一个不問政治的人。他之所以要用“不問政治”这塊招牌，在解放前是更便利于他与反动統治勾結，在解放后是使他可以更隱蔽地進行反党活动。因此潘序

倫是一個熱衷於反動政治活動、敵視社會主義事業的右派分子。

潘序倫的第二個幌子，就是偽裝的“會計專家”。這二塊招牌是相互為用的。解放前潘序倫為了要爬上反動政治舞台，就要依靠這個偽裝的學者招牌，博得反動主子的青睞，他與反動統治的勾結就要利用這塊偽裝的學者招牌，這招牌也為反動統治裝點了門面，所以為反動主子所樂意。同時，“不問政治”的招牌又使他的偽裝學者招牌打扮得更迷人。因此，潘序倫是十分珍視這二塊招牌的。

潘序倫這個偽裝的“會計學者”是利用他的“立信會計事業”起家的。他為反動官僚資產階級乃至帝國主義的企業服務，並勾結反動政權把自己打扮成一個“名會計師”。他利用盜竊別人的勞動成果、抄襲剽竊，粗制濫造了大量的書，通過立信會計圖書用品社來出版，通過立信的各種學校來傳布。他就是这样用巧取豪奪、不擇手段的辦法，利用“立信會計事業”把自己偽裝成一個學者，在解放前爬上了反動的政治舞台，在解放後利用它來反黨反社會主義。

潘序倫就是在這樣二塊招牌的掩蓋下，進行他的陰謀活動，企圖讓美蔣復辟，把我們的國家重新拉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道路上去，使他可以繼續象解放前那樣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

但是，今天中國人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已經堅決要走社會主義的道路。廣大的群眾完全認識到，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我們祖國的獨立、富強，就沒有我國人民的自由、幸福；而建設社會主義，如果沒有共產黨的領導，是完全不能設想的。象

潘序倫那樣一小撮的右派分子，他們企圖讓歷史的車輪倒轉，只能枉費心机。在群众憤怒的揭發下，他們的陰謀，已經暴露無遺。我們必須和他們堅決鬥爭到底。

（李鴻壽）

## 以學術研究為借口，妄圖資本主義復辟

### (一)

右派分子潘序倫從去年我們對他進行鬥爭以後，一直到現在始終玩弄着兩種手法，這兩種手法是什麼呢？第一，他把自己描繪成爲“年老力衰，深居簡出，勉度殘年”的人。他說：“我是很少出門，和外界很少接觸，解放後既沒有在大會上發言，又沒有寫過什麼文章。”好像他在大鳴大放之前，就一直沒有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言行。同時，他還要裝着一副可憐相，說什麼“我在家里獨居幽處，只是偶爾到肇嘉浜路散散步，除了家人以外，幾乎沒有和任何人見過面，談過話”，“完全處于孤立的情況”等等。他千方百計地企圖在我們當中造成一種印象，好像潘序倫只是在大鳴大放的時候，偶爾講錯了話，或者偶爾有些不滿情緒而已，象潘序倫那樣深居簡出，閉門讀書的人，那里還會有什麼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言行？就是有，也談不上有什麼危害性。這是他為自己開脫罪行的一種手法。

他的另一種手法就是在我們當中造成另一種印象，好像潘序倫只是因為立信事業垮台了，所以他才有些“牢騷抑鬱”，所以“對於新事物新環境才表示不滿”，他說：“我正因为有這樣不滿，因此才發展成爲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反動政治立場。”這樣說來，好像潘序倫只是在立信事業被改造以後，才



有不滿情緒；只是在去年大鳴大放期間才偶爾有些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言行。

但是，事實是怎樣呢？潘序倫的反動言行決不是在大鳴大放的時候才有，他的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言行是一貫的。潘序倫在解放前就是一貫披着“會計學者”的外衣，打擊進步力量，迫害進步職工和進步學生，對共產黨有着刻骨的仇恨。這裡，暫時不談潘序倫在解放前的反動罪行，先來看看他在解放後是怎樣一貫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潘序倫從解放一直到現在，始終存在着嚴重的變天思想，妄想資本主義復辟。我們只要從他解放後所寫的书本當中，也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潘序倫一直在夢想蔣介石反攻大陸，一直在夢想資本主義復辟，盼望着反動政權復辟以後，又可以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

潘序倫在解放後編寫（包括翻譯）了十來本書。他在解放後的這些寫作活動，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時期：

第一時期，從上海解放到1950年上半年。他在這個時期里，專門翻譯美國最反動的會計書籍，他自己並不寫書，如果以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所謂“述而不作”時期。這個時候，潘序倫滿以為蔣介石馬上可以反攻大陸，所以他要“述而不作”，以表示對反動政權的忠貞。

第二時期，從1950年下半年到1952年上半年。這個時期，他陸續編寫了不少書，大量販運資本主義會計毒素，以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所謂“陸續改編”時期。他在這一時期里，開始是明目張膽地傳播資本主義會計毒素。接着又寫了“蘇聯會計述要”、“國營企業會計概要”二本書，在這二本書里，他用

偷天換日的方式來販運資本主義會計的私貨。同時，他在行動上又積極抗拒社會主義改造，等待着第三次大戰爆發。

第三時期，從“五反”運動到現在。這時候起，他就不再寫書了。他表示堅決不寫，在形式上是消極抵抗，實際上是等待時機，等待反動政權的復辟。他並且利用鳴放機會，猖狂地向黨進攻。

下面我們可以分別從他在三個時期中一些具體的反動言行來說明他一貫站在資產階級右派立場，存在着嚴重的變天思想，妄想資本主義的復辟。

\* \* \*

現在我們先來看看他在第一個時期，也是“述而不作”時期的一些表現和他在會計書本中的反動言論。

或許有人要問：潘序倫為什麼不到台灣去，而要留在上海？其實他在1948年上海解放前夕，他已經逃到重慶去過。他後來為什麼又回到上海來呢？其中原因之一，就是想繼續販賣他的資本主義會計，來毒害人民。同時，他留下來也是為了等待時機，夢想蔣介石回來以後，可以表功聽賞。

潘序倫留下來散播資本主義毒素，假借“學術”幌子來攻擊社會主義，是早有準備的。在上海解放前夕，潘序倫就托人去香港、美國搜羅大批所謂“最新”，也就是最反動的資本主義會計書籍，準備在解放後有計劃、有目的地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

上海一解放，潘序倫依靠他的“會計學者”的假招牌，馬上開始進行翻譯工作，販賣最腐朽的資本主義會計。潘序倫自己在1949年6月所寫的“公司會計准則緒論”的譯者序言中，有

一段很明白的招供。他在这一段里是这样說的：“茲以閑散之身，拟作三年之計……將現代會計学中最主要之新文献，陸續译譯，以享讀者，但暫秉述而不作之志，以事从于此。”

象潘序倫那样的人，在解放前，又做官，又做會計師，还寫出(即使是用粗制濫造的手段)大量的會計書籍，为什么一解放，他忽然要來一个“三年之計”，“述而不作”呢？原來潘序倫所講的“三年之計”是有它的來歷的，蒋介石还不是也講过“一年准备，三年反攻”嗎？这还不是可以很明顯地看出潘序倫与台灣蒋介石是一唱一和，相互呼应嗎？潘序倫根据他过去的反动政治經驗，以为共产党最多不过三年就要垮台了，所以他表示在三年之内，一面保持“閑散之身”，“述而不作”，以表示对反动政权的忠貞；另一方面又在窺測方向，等待时机，等待蒋介石很快的返回大陸。

潘序倫也知道：如果光靠蒋介石集团的殘余力量來反攻大陸是沒有希望的，因此他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美帝國主义的身上。我們从他解放初期所翻譯的几本書的譯者序言中，就可以看出他这种反动情緒了。例如：他在1949年8月为他的几本譯本所寫的“立信會計譯叢总序”中說：“十余年來，西方各國會計理論及实務，已多進化，新著迭出，迥異曩时，我國學者允宜急起直追，予以研究，以資攻錯。”很明顯，他对美國存着很大的幻想，把他自己的希望寄托在美帝的身上，把美國看成什么都是好的，連會計也是美國第一，所以他要讀者不要向苏联學習，而要向西方學習，向美國壟斷資本家的御用學者學習。在他这些譯作沒有發表之前，毛主席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已經提出了一面倒，學習苏联的号召，而潘序倫却明目

張胆地宣揚資本主義會計的進步，要我們向美國學習。這除了暴露他的反動立場以外，還能有什麼其他解說呢？

同時，我們從這裡也可以看出，潘序倫後來在上海市政協座談會上說什麼“美國生產力高，我們不要閉關自守”，又說“我是學會計的，而現在對蘇聯會計好像沒有一點缺點，而英美會計就都是缺點，好像沒有一點好的地方”等等右派言論都是由來已久，與他在譯者序言中所散布的謬論都是一脈相承的。

\*                     \*                     \*

接着我們再來看他在第二時期，也是他自己所謂“陸續改編”時期所流露出來的變天思想。

到了1950年下半年，潘序倫看到了我們人民政權非常鞏固，共產黨在群眾中有着極高的威信，因此他知道“三年變天”是沒有希望了，不得不拋棄“述而不作”的謊話，而另作打算。他從這個時候開始，不再作翻譯工作了。他從1950年開始先後寫了“基本會計學”、“通用簿記教程”、“高級會計學教材”……等書，在這些書里，也充分暴露了他的“等待時機”的變天思想。

例如：他在“基本會計學”、“通用簿記教程”、“簡易商業簿記教程”等書里，沒有一個地方提到“共產黨”、“人民政府”、“解放”等字樣。在解放以後，寫社會科學方面書籍，而不提“共產黨”，不提“人民政府”，不提“解放”，這是難以想像的。除了寫作人對新社會抱着極端反動的態度以外，再也沒有其他解釋了。

不僅如此，他在“通用簿記教程”一書的“政府簿記制度”一章中，他是怎樣來解釋“政府”兩個字呢？他說：“例如一個國

家必有一个中央政府，國內某一地区，如一省、一市或一縣之類，必有一个地方政府”，他絕口不提中央人民政府、地方人民政府，由此可見潘序倫对解放、对人民是多么的仇恨。很明顯，他絕口不提“人民政府”是妄想蒋介石回大陸時，可以表白他对反动政权的忠貞，以報功領賞。

当然，他在書本中還不敢明目張胆地对人民政府進行污蔑，只是用了含沙射影的方法來進行攻击，而在不公开的場合，他就可以更放肆地來進行更惡毒的污蔑了。他曾經这样說过：“从前的人算命时五行缺什么，名字就叫什么，如缺水就叫森，缺金就叫鑫；現在的國名也有同样的情形，所以叫‘人民共和國’，‘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國’。”这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是多少惡毒的污蔑！

潘序倫 1951 年所寫的“通用簿記教程”，还在香港立信會計月刊上做了一条广告，在广告中說：“本書所述各种簿記組織及制度都極为实用，讀者可各隨其环境的需要，選擇实施，……讀完本書，当能在任何事業机关担任普通簿記职务。”（第 17 期）这里所指的环境是指的什么环境？这里所指的“任何事業机关”，又是什么事業机关？他所指的环境，难道还不是指的香港的环境、台灣的环境嗎？他所指的事業机关，难道还不是指的是香港事業机关和台灣事業机关嗎？这难道还不是赤裸裸地暴露出他的变天思想嗎？

潘序倫在他的所謂著作当中，还一再地引用國民党的“六法全書”，甚至于說：“公司盈餘分派，虽由股東會議定，但仍应遵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規定办理，苟有違反，即使实行分配，公司債權人仍有权請求受分配人返還所分得的金額于公

司。”（“基本會計学”第 319 頁）他簡直還是拿他的偽經濟部次長的口吻來教訓人。潘序倫在去年鳴放的時候，污蔑新社會沒有法制，他睜着眼睛看不到人民的立法，原來他所要的是國民黨的六法全書。

他在 1950、1951 年所寫的很多書籍當中，都流露出他希望資本主義長期存在的反動情緒。他說：“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存在時間將不會很短，而是相當長久的。”（“高級商業簿記教程”序言第 3 頁）他在另一本書里也說：“有些會計學讀者，甚至看見‘資本’兩字，就發生不痛快的感覺，這種情緒，我們認為與新民主主義社會是不相配合的。”請大家看一看，潘序倫對於資本主義事業，是有多么強烈的感情，甚至於我們討厭“資本”，他都覺得不痛快。這就難怪他千方百計地抗拒社會主義改造，難怪他後來污蔑“五反”運動打擊了他的積極性了。潘序倫堅決站在資產階級反動立場，維護資本主義制度，從這裡也得到最明顯的證明。

潘序倫等待時機，夢想資本主義復辟的變天思想，不但在他所寫的書本中到處流露出來，而且從他的具體行動中也可以得到充分證明。例如：他解放後先後辭去了立信會計專科學校、立信會計補習學校等校長職務。如果潘序倫願意為人民服務，願意為建設社會主義出力，他本來應該繼續擔任校長，努力办好學校。但由於他敵視人民政權，存在變天思想，因此不但辭去校長職務，進而在“二六”轟炸，學校十分困難的時候，還企圖抽回已經作為學校基金的版稅。

他不但不作校長，他解放後什麼工作都不作，我們政府本着既往不咎的精神，不但沒有清算他過去的反動罪行，而且多

次請他出來為人民服務，本來他應感恩圖報，出來立功贖罪。但是潘序倫却借口身體不好，加以拒絕。事實上潘序倫的身體很好，到處遊山玩水，登山涉水，比一般年輕人還要強壯。特別在抗美援朝戰爭開始以後，人民銀行總行約他到北京去工作，但他想盡種種辦法不去。他滿以為第三次世界大戰就要爆發了，美蔣又要回來欺壓人民，因此他堅持不去，還是保持他的“閑散之身”，這樣對於美蔣也就好交代了。

到了1951年下半年，看到了各地從事財務會計的干部都要求學習蘇聯，潘序倫知道再明目張膽地販賣資本主義會計是不行了，因此就搖身一變，居然寫起“蘇聯會計述要”，“國營企業會計概要”兩本書。看起來似乎他也想為社會主義服務了，可是事實上他是披着介紹社會主義會計的外衣，在販賣資本主義會計的私貨。而且他是用了更巧妙的手法來攻擊社會主義制度，歪曲和污蔑社會主義會計。

\*             \*             \*

現在再看看他在第三時期，也就是“五反”運動以後的一些表現。

“五反”運動開始以後，潘序倫停止了他的編寫工作，為什麼他過去那樣積極的編寫（據他自己說，每天可以工作十個小時），而到了“五反”以後一下子就寫不了呢？

潘序倫自己對於他在“五反”以後不寫書，又是怎樣解釋呢？

他說：“我自己覺得，不應該繼續寫書來傳播資本主義會計毒素，因之從1952年下半年起，擱筆不再寫書。”看來潘序倫居然是一個勇于認識錯誤的人呢！這是天大的謊話！這種解

釋是完全不能自圓其說的！

因为如果他真正認識了錯誤，真正有悔改的意思，那就應該接受社会上对于他寫作的批評，積極地學習，努力改造自己。但是他不是采取这种态度。他从那个时候开始，表面上裝得十分消沉，但实际上是繼續等待时机。到去年鳴放时，他認為时机已經成熟，就对党对社会主义开始了全面的進攻。

也許有人会說，潘序倫过去寫書，僅僅是为了賺錢，多拿版稅，这种看法当然是錯誤的。如果他僅僅为了賺錢，那末在1952年以后，會計書的銷路还是很好的，不少人都在寫書，而潘序倫那样一个剝削大师居然連錢也不要了。

由此可見，潘序倫在“五反”以后之所以不寫書，既不是由于他已認識錯誤，也不是由于他沒有錢可賺才不寫了。他不寫書，是有他的積極的政治目的。他的目的就是想留些余地，等待資本主义复辟，以表示他始終效忠于反动政权，始終效忠于資本主义，否則他就无法交代了。潘序倫自己还不是也招認过嗎：“我用消極抵抗的手法，以达到積極的目的，就是等待时机。”很顯然，他所謂等待时机，就是等待向党進攻的时机。

的确，在匈牙利事件以后，他的反动政治态度表現得更加明顯了。在各种不同場合都散播了很多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論，滿以为共产党不久就要垮台了，而他朝夕夢想的資本主义不久就可以复辟。

\*                     \*                     \*

总起來說，我們从潘序倫解放后的寫作过程來看，从开始“述而不作”时期，接着到了“陸續改編”时期，最后到了“坚决不寫”时期，都說明潘序倫存在着嚴重的变天思想，妄想資本



主义复辟。他对于我们人民革命的勝利是一直不甘心的，他一系列的行动，包括他在寫作方面的行动，都充分暴露出他的反动透頂的变天思想。从他的寫作过程来看，也可以知道他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决不是从去年大鳴大放后才有的，而是一貫的。同时，他在寫作方面所散播的大量反动言論給予讀者的危害性也是很嚴重的，因此我們对于潘序倫在會計書本当中所散布的反动謬論必須加以徹底批駁，他的企圖使資本主义复辟的陰謀必須加以徹底粉碎。

(郭森麒)

## (二)

右派分子潘序倫的反动罪行被揭發后，他就竭力把自己打扮成为一个專門从事學術研究、不問政治的人。但事实究竟怎样呢？

解放前在潘序倫的傳記中曾經这样寫道：“先生对于國家社会極具热心，民十七年立法院及工商部修訂公司法，供獻意見極多，廿五年秋所得稅暫行條例及施行細則頒行，先生提供意見，鼓吹提倡，不遺余力。”（見公信會計月刊第二卷第二期會計界人物志）潘序倫就是这样積極地为反动統治出主意，这难道是不問政治嗎？

潘序倫对于反动立法的政治态度是十分鮮明的。例如他在“所得稅原理及实务”一書的序中說：“本所（按指立信會計師事務所）为拥护推行良稅起見，首于附設之立信會計学校中开办所得稅科，由著者親任教職。”又說：“本所对于所得稅之推行，除开办所得稅講習科外，复应各界之邀，作公开之演講，

……先后不下数十起。”

潘序倫解放前在“我國工商會計应有之改革”一文中曾經竭力主張要制訂兩個法規，一個叫做“商業會計法”，一個叫做“商業登記法”，這二個法都是由偽經濟部草擬，而潘序倫正是當時偽經濟部次長，可見潘序倫就是積極參與這個事情的。

由此可見，潘序倫決不是不問政治，而是十分積極的參與反動政治的。

現在讓我們看看他解放後的态度。

解放後，黨和人民請潘序倫參加了政協，叫他參加刑法草案的討論。但是潘序倫不但沒有積極的提供意見，反而叫囂說“新社會無法制”，對社會主義進行污蔑和攻擊，這難道是不問政治嗎？問題已經十分清楚，潘序倫在解放前為國民黨反動統治積極獻策，“不遺余力”；解放後却對人民政府仇視對抗，他的反動立場是如此的鮮明，怎麼能說是不問政治呢！

潘序倫又說，他在會計書籍中是一向不談政治的（除在政府會計中，或引用法律條文時是例外）。這也完全是謊話。潘序倫在審計學一書中講到審計之效益時說：“近代勞資糾紛之事，日益眾多。考勞資糾紛之發生，多以工資之加減為口實。故一切營業之會計，若按期審核，有公正之報告，公開於大眾之前，則勞動者，可以明悉資方之有無盈利。苟使確無盈利，則資方固可以自解於勞動者，即勞方亦不能強求工資之增加，是足以消弭勞資糾紛於无形也。”他還出了一個問題：“為免除勞資糾紛起見，各工廠帳目，平時應請會計師審查，何故？”這難道不是政治問題嗎？

潘序倫在“通用簿記教程”一書末兩章“政府簿記制度”中

所使用的手法也是十分險惡的。他在这兩章开始时做了一个說明，說这两章的内容是取材于美國斐南的會計学原理（見通用簿記教程下冊 342 頁脚注）。潘序倫从他美國主子那里抄襲販賣來的私貨本來就不少，但他为什么在其他地方不做注解，單單要在“政府簿記制度”这章中做个注解，其用意不是很明顯的嗎？潘序倫的这个注解就是寫給香港和台灣看的，“我寫的不是人民政府”，“我举的实例是美國的实例”，这难道不是潘序倫在表白他对國民党的忠貞嗎？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又怎能解釋香港广告中的那句“極合实用”的話呢？（潘序倫曾把通用簿記教程到香港去登广告，广告中有“本書所述各种簿記組織及制度都極合实用，讀者群众可各隨其环境的需要选择实施”等語。）而且通用簿記既是著作的，为什么要翻譯美國的东西？为什么他在解放前寫政府會計是“根据現行法令編制”，“对于各种新頒有关法令，虽尚未定有施行日期者以及尚有若干偏僻地方仍旧繼續应用之旧制度，亦酌量附入”（見“中國政府會計制度”例言）；而在解放后，倒不用現行制度呢？

由此可見，右派分子潘序倫对反动的國民黨，对反动的國民政府是血肉相連，積極投靠，獻計謀策，忠心耿耿。而他对共產党，对人民政府却是切齒仇恨，是抗拒，是污蔑，是敵視。揭開潘序倫“不問政治”的皮，就是他的——貫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本質。

（俞冠敏）

## 打着“會計是純技術”的幌子， 否定會計核算的階級性

解放后，右派分子潘序倫為了想使讀者相信他所說的“會計沒有階級性，會計是純技術”，以達到他繼續宣揚資本主義會計的目的，曾經在他所寫的書本中散布了大量的謬論，這些謬論必須加以駁斥和批判。

首先，潘序倫曾經替會計下了一個定義，他說“用貨幣數額來作經常有系統的計算的方法就是會計”（“國營企業會計概要”第5頁）。從這個定義中，潘序倫把會計說成是一種計算方法，是一種純技術，是沒有階級性的。但是，我們認為會計不僅是從數量上來反映社會經濟過程，而更重要的是從性質上來反映社會經濟過程，也就是反映社會的生產關係。因此，會計的本質是受人類社會各個歷史發展階段上的經濟制度所決定的，會計是屬於上層建築的範疇，它是從該社會的經濟基礎中產生，並積極地為該社會經濟基礎的鞏固和發展而服務。在階級社會里，會計是掌握在統治階級的手中，作為加強和鞏固其統治的有力工具之一。所以會計具有鮮明的階級性。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會計是替資本家掩蓋其剝削真相和尋找進一步加強剝削的途徑，因此，它是為資本家的利益服務的。這就決定了資本主義會計的虛偽性和反動性。但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會計是積極地促進社會主義經濟不斷向前發展，因此它是

为劳动人民的利益服务的。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会计的真实性和科学性。潘序伦不仅在会计书籍中宣扬“会计没有阶级性”这种谬论，而且还在历次演讲中公开地大肆宣扬这种谬论。潘序伦曾假惺惺地说“他对于会计阶级性十分模糊”。这当然是一个做头做尾的谎言。潘序伦为了宣扬资本主义会计来达到维护资本家的利益，替他们掩盖和加强对劳动人民的剥削罪行，企图缓和阶级斗争，维持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目的，所以他才不惜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用恶毒阴险的手法来宣扬会计是没有阶级性的，资本主义会计是永远可以适用的，资本主义会计和社会主义会计是没有区别的谬论。

其次，潘序伦又大事宣扬所谓“新民主主义会计”的谬论。他所宣扬的“新民主主义会计”，实质上还是宣扬资本主义会计，即使在不得不提到社会主义会计的时候，他也是极尽其歪曲和污蔑的能事。因此，潘序伦所宣扬的“新民主主义会计”的谬论，也是他抹煞会计阶级性的另一种手法。大家都知道，我国新民主主义社会是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具有过渡性质的社会。正如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上所明确指出的，在这个时期内，虽然同时存在着五种经济成分，但是在这里还包含着国营经济领导权的基本问题，也就是二条路线斗争的谁战胜谁的本质问题。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是整个国家经济的领导力量，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日益进展，就必然会促使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增加和其他各种经济成分的逐步消减，并最终转变为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八年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伟大成就，已经充分地证

明了这个真理。因此，在过渡时期中，作为上层建筑的会计应该是社会主义会计而决不是什么“新民主主义会计”。潘序伦一方面利用“新民主主义会计中所包含的私营企业会计”的无耻谎言来大事宣扬资本主义会计的反动理论，说什么：“私营企业在新的民主主义社会中所适用的会计，应与国营企业会计互相配合，不相冲突”（“国营企业会计概要”第5页），“修习了私营企业簿记会计的人们进一步来修习新民主主义经济中的国营企业会计，再进一步来修习苏联先进的社会主义会计，可说是追随着新民主主义的革命阶段而对会计一科作进修工作的应有步序”（“会计学教程”第一册前言），“国营企业会计概要”一书是“为已经习过私营企业簿记会计的读者们作补充读物”（“国营企业会计概要”例言）。另一方面，潘序伦又尽量地歪曲和污蔑社会主义会计，说什么：“国营企业会计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会计，但它并不就是社会主义会计”（“国营企业会计概要”第5页），“国营企业各种定额资产的会计处理，基本上与普通会计中（按指资本主义会计）所讲这些资产的处理方法并无不同”（同上书第86页），“国营企业会计事务的处理程序，如与一般私营企业会计事务的处理程序相比较，在大体上可说是相同的”（同上书第175页）。从以上这些谬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潘序伦是怎样地用“新民主主义会计”来宣扬资本主义会计，反对和污蔑社会主义会计了。同时，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潘序伦是怎样宣扬社会主义会计和资本主义会计之间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来否认会计阶段性的反动谬论了。

再次，潘序伦还宣扬着“会计是纯技术”的谬论，例如他

說：“使广大的人民可靠它獲取這項应用机会非常普遍的生活技術”(“通用簿記教程”序言)，“我們希望讀过了這本書的人們，对于簿記工作的就業可以得—比較普遍的机会”(同上書第1頁)，“为讀者打开一条走上成本會計的道路，这也是一般簿記从業員在工業化的現时代中所不可不备的常識”(同上書第3頁)等等。对于潘序倫这种論調我們必須嚴加駁斥。正如我們講过的，會計是具有鮮明的階級性，在階級社会里，它是执行着該社会統治階級所賦予的特定任务和目的，會計是上層建筑，是为社会的經濟基礎服务的，它絕對不是什么“純技術”。因此，潘序倫宣揚“會計是純技術”的謬論在實質上是否定會計的階級性，从而替他傳播反动的資本主义會計開闢門路。不僅如此，潘序倫还惡毒陰險地用“謀生技術”的說法來欺騙讀者們，企圖麻痺他們的階級覺悟，甘心情願地为資本家服务。

从以上可以看到，潘序倫在會計書籍和演講中的謬論是有其政治目的的，是他一貫地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活动的一部分，这就更加証明了潘序倫是一个徹头徹尾的右派分子。

(吳戴之)

## 宣揚資本主義會計，為資本主義制度辯護

### (一)

潘序倫在其解放後所編著的會計書籍中，不但竭力宣揚腐朽的資本主義會計學，為資本主義會計理論進行辯護，企圖從而抹殺先進的社會主義會計學的優越性，還公開叫囂資本永恆的謬論，歪曲事實，企圖掩蓋剝削的真相，以維護資本家的利益。這說明他的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論調，由來已久，他的處心積慮，已非一朝一夕。

這裡，就潘序倫在解放後所編著的各本會計書籍中，有關宣揚資本主義會計、為資本主義制度辯護各點，加以駁斥和批判。

首先，根據潘序倫的說法，只有資本主義會計學才有理論，才有豐富的內容，如果去掉了這些內容的一部分，就會使會計學空無所有。在他解放後所編著的書籍中可以看出他有這樣一個企圖，就是想竭力說服讀者們來學習資本主義會計學，他要在廣大的讀者中造成這樣一個觀點：即只有資本主義會計學才有豐富的內容，值得學習；社會主義會計學是卑不足道的。在他所編著的“基本會計學”、“高級會計學教材”和翻譯的立信會計譯叢中，就可以找到下列各段：

(1) 立信會計譯叢總序：“十餘年來，西方各國會計理論及實務，已多進化，新著迭出，迥異曩時，我國學者允宜急起直



追。”

(2) “基本會計學”例言第一頁：“二十年來，會計學術有了長足的進展，并有比較以前更為豐富的内容。”

(3) “高級會計學教材”序言第5—6頁：“我們必須使他們能對各種會計原理及方法（包括資本主義會計的原理及方法在內）作理智的批判和選擇，我們必須訓練他們，使成為會計立法者的候補人。”

(4) 同上書序言第5頁：“假如象有些人所主張的那樣，把原在高級會計學中所討論的這樣那樣一一予以刪節揚棄，這一課程的内容豈不要成為空無所有？”

(5) 同上書序言第4頁：“又有人見到在先進的蘇聯會計學中，對於財產的計價，只採用‘成本’基礎，因而認為在我國目前所編的高級會計學中，應同樣把財產的其他各種計價方法，一律刪除不講，我覺得這種意見似失學術研究的意味。”

(6) 同上書序言第4—5頁：“另有些人認為資本主義會計對於固定資產的折舊曾提出了五花八門的方法，以便資本家對於損益計算可能上下其手。在社會主義會計中，所用折舊方法只有一種直線法，以我國實際情形來講，不論公營私營企業也可說一律採用了直線折舊法，那末其他折舊法自應認為在中國毫無所用，並對於社會主義的會計理論不合，而應在刪節揚棄之列了。我對於這種主張，也未敢貿然接受。……”

(7) 同上書序言第2頁：“假如我們寫一本高級會計學而只以國營企業為對象，那就成為一本國營企業會計制度而無所謂會計理論的研究了。”

從上述詞句中，不難看出潘序倫的用心是非常險惡的。他

一方面竭力宣揚資本主義會計學的豐富多采，值得學習；另一方面又暗示社會主義會計學是沒有理論的，不值得學習的。這樣他不但可以為他的那些粗制濫造的會計書籍，廣開銷路，還可阻止廣大的會計工作者向蘇聯的先進會計學學習，這種宣傳的危害性是巨大的。

以下想來談談：我們應當不应当向資本主義會計學急起直追地學習？資本主義會計學是不是真的豐富多采？社會主義會計是不是真的沒有理論和空無所有？

第一，我們要指出潘序倫的主張向資本主義會計學急起直追地學習，反對向蘇聯的社會主義會計學習，是一貫的。在去年大鳴大放時期，他也有同樣的論調。他說：“我是學會計的，而現在對蘇聯會計好像沒有一點缺點，而英美會計就都是缺點，好像沒有一點好的地方。”這說明潘序倫的這種主張自解放後八、九年來是一直堅持着的。

我們知道，資本主義會計是資本家剝削的工具，是完全為資本家服務的。這種會計和社會主義生產毫無共同之處。潘序倫在那時候不是不知道我們是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在他的高級會計學教材第一分冊的序言中一開頭他就說：“我國此刻正在由資本主義社會走上社會主義社會的途程中”），他却要我們大家來向資本主義會計“急起直追”地學習，這不是牛頭不對馬嘴嗎？顯然，潘序倫存在着變天思想，他妄想反動政權的復辟，而先作準備。

可能潘序倫會說，他的主張向英美會計學習並不是要全盤向英美會計學習，而是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要在學習蘇聯的基礎上兼學英美之長。（關於這種學習方式有否必要，現

在姑且不談。)潘序倫是否真的这样呢?完全不是的,在潘序倫看來,只有資本主义會計才有“丰富的內容”,而社会主义會計就“空无所有”。

第二,讓我們來看看資本主义會計学是否真的丰富多采?我們知道資本主义會計是为資本家服务的,資本家在各个不同的場合下所需求于會計工作者是不同的。因此資本主义國家的會計工作者为了要滿足資本家的要求,就不得不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处理同一的會計事項,这种情形在財產計价和折旧計算中最为明顯。例如:当企業的資產負債表用来作为向銀行借款或增發股票吸引投資的根据时,其中所列各項資產的价值就要尽量估高,估高的方法或是用高过于成本的时价計算,或者是尽量少計折旧;但当企業的資產負債表用作向稅局报稅或發給股東作年度报告时,其中所列各項資產的价值又須尽量低估,企圖少繳稅款或少發股息,低估的方法是尽量多計折旧(如复利法),或采用实际并不存在的一种过低的成本水平來計算存貨的价值,例如基本存量法。在处理应收帳款的估价时,也通过所謂呆帳准备來上下其手。这种所謂用不同的方法来处理同一會計事項或是僅憑个别會計人員的意見与批判力來決定財產价值与計算損益,实际上是不折不扣的伪造資料的欺騙伎倆,而潘序倫却称之为丰富多采,值得學習研究,顯然是混淆是非,顛倒黑白,不值識者一駁。

第三,潘序倫污蔑社会主义企業的會計核算为“沒有理論”的和“空无所有”的,这是不是事实呢?我們認為这完全是顛倒黑白的妄語。如上所述,在資本主义國家里,會計工作者为了滿足資本家的要求,必須伪造和歪曲資料;而所謂“會計

理論”也无非為欺騙、偽造、歪曲找尋理由。這就是說在資本主義國家里會計核算是不能反映真實的情況的。與此相反，在社會主義社會里，會計核算是反映和領導經濟過程的工具，為了滿足這一要求，會計核算必須真實地、完整地、明細地反映企業經濟活動的過程及其成果。正因為這樣，會計學才具有科學性，才成為真正的社會科學。我們知道，在社會主義社會里沒有任何客觀條件要會計工作者來偽造和歪曲核算的資料，從而欺騙會計報表的閱讀者。在這種情形下，資產負債表上所列各項資產的計價，就必須按其實際成本來計算；同時，固定資產的折舊亦只須按其平均的機能時間來尺度，這說明社會主義會計核算的準確性和科學性遠非資本主義會計所能比擬。

從以上論述中，不難看出潘序倫的立場、潘序倫的觀點、潘序倫的愛憎是恰恰和人民的立場、觀點相反。人民所喜愛的，就是潘序倫所憎惡的；潘序倫所喜愛的、要學習的，就是人民所唾棄的。這說明潘序倫之成一個右派分子，是不足為奇了。

其次，潘序倫還宣稱資本主義會計學的理論和方法可以同樣適用於我國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企業。在他的“高級會計學教材”和“國營企業會計概要”中有下列各段：

(1) “高級會計學教材”序言第 2 頁：“我以為有很多的會計原理與方法是同樣可以適用於國營企業和私營企業的。以會計循環中所列舉的各項步驟為例，除會計科目的內容及排列方式在國營企業與私營企業有些不同外，所有會計憑證的制作、原始記錄、過帳、試算及調整結算等程序，在技術上都可同樣適用於國營企業與私營企業。”

(2) “國營企業會計概要”第 175 頁：“國營企業會計事務

的处理程序，如与一般私营企业会计事务的处理程序相比较，在大体上可說是相同的。”

(3) “国营企业会计概要”第 86 頁：“国营企业各种定額資產的會計处理，基本上与普通會計中所講这些資產的处理方法，并无不同。”

我們知道，會計核算是一門具有極強烈的階級性的社会科学。在不同的社会經濟制度里，會計核算的具体任务、对象和方法都不可能相同的。在資本主义社会里，資本家要利用會計核算資料來应付競爭，掩盖剝削真相，因此會計核算的方法和組織是極端任意的，不統一的，也不可能來觀察整个國民經濟的發展情况。与此相反，社会主义的會計核算必須真實地反映國民經濟的發展情况，因此必須是統一的，它的指标必須和計劃內所規定的相一致。

所以資本主义會計核算和社会主义會計核算，無論就他們的本質和形式上講，都是絕不相同的。正象資本主义社会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會計核算一样，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也决不可能采用資本主义會計核算。上述潘序倫的这些詞句，是想灌輸給讀者們一种錯誤观点，那就是會計核算是一門單純的技術，它沒有階級性，無論在資本主义社会里或者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都可以原封不动地运用。这样可以达到他企圖在我國国营企業里仍然保留資本主义會計陣地的妄想。这种鬼蜮伎倆，如果得逞，对于我國社会主义建設將帶來重大損害。

此外，潘序倫还深恐上述的企圖不能得逞，因此又鼓吹資本主义會計和社会主义會計在我國可以和平共处的謬論，以求至少在当时的私营企业仍能保留資本主义會計的最后陣

地。例如在“國營企業會計概要”第5頁里，他說：“私營企業在新民主主義社會中所適用的會計，應與國營企業會計互相配合，不相沖突。”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潘序倫為了維護資本主義會計而所作的努力，已無所不用其極。最初恣意贊揚資本主義會計，誹謗社會主義會計，企圖在一開始時即扼殺社會主義會計在新中國的萌芽；繼之以混淆社會主義會計和資本主義會計間的區別，企圖將資本主義會計長入社會主義會計，以求能保留資本主義會計在國營企業中的障地。以上兩計均不可能得逞，乃宣揚所謂“新民主主義會計”，妄想社會主義會計和資本主義會計和平共處。這三支毒箭只要一支持得逞，不但目前我國所存在的社會主義核算的基礎無由建成和鞏固，即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本身，亦將因缺乏其所適用的核算資料而受到嚴重損害。

于此，我們可以看出潘序倫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行並不是從去年大鳴大放時開始。早在1949—52年間，潘序倫即已假借研究學術之名，恣意宣揚腐朽的資本主義會計，詆毀社會主義會計，還明目張膽地叫囂資本永恆的謬論，企圖維護剝削，破壞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這些反動的論調如不加以揭露和駁斥，不但遺害於這些書籍的廣大讀者，亦會使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直接受到損害。因此潘序倫在這些書籍內的主張，不應以一般的學術思想來看待，必須徹底揭穿這一偽裝會計學者的假象，暴露其陰險惡毒的真面目，然後對於這些論調加以深刻的批判與駁斥，才能根除這些右派言論在我國會計界的影響。

（龔清浩）

## (二)

右派分子潘序倫不僅在解放前長期依靠反動的政治勢力，做會計師，辦會計學校，開設會計圖書用品社，擔任偽經濟部次長，偽上海市臨時參議員等反動職務；就是在解放後仍“擬在二、三年內，乘進而不作之志”，怀着變天思想，等待反動派頭子蔣介石回來；去年又向党向人民向社會主義叫囂和攻擊。說什麼“新社會無法制”，“既無自由，又無是非”，“定息不是剝削”，“要求統計因計劃錯誤而造成的損失”等等。右派分子潘序倫就是這樣一貫的長期的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我們必須和他進行堅決的鬥爭。

也許有人認為，在政治立場上我們和右派分子潘序倫是有根本的分歧，但是，他還編寫過一些會計書籍，和他的政治問題沒有多大關係。這正是右派分子潘序倫迷惑人的地方。我們只要看看解放後他在會計書本中所散布的大量反動論點，就可以看出他的反動政治陰謀。

首先，我們不看別的，只看潘序倫自己的招供就可以知道了。他在1949年翻譯的“會計譯叢”的總序上說：“西方各國會計理論及實務，已多進化，新著迭出，迥異曩時，我國學者允宜急起直追，予以研究，以資攻錯。因復集合同人，再度致力於會計編輯工作。”（見“合併決算表”總序）右派分子潘序倫不是明顯地說：他編寫會計書籍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讀者在會計上學美帝，走美帝的道路麼？

潘序倫還在同一總序上說：“俟至相當階段，再將前著立信會計叢書陸續改編，以適應我國新的環境及需要。”右派分

子潘序倫又是不明顯地要我們在新中國的情況下學習資本主義會計么？在1949年以後的幾年里，右派分子潘序倫實實在在的就这样做了。

潘序倫在1951年寫的“高級會計學教材”的序言中說：“我們認為對於私營企業會計的研究，還是為配合新民主主義社會對於會計的實際需要而進行的。”他還找出一些理論根據要我們不得不學私營企業會計，也就是資本主義會計。

不但如此，右派分子潘序倫又想出種種辦法要我們學他所編寫的一些宣揚資本主義會計的書籍。他在1952年寫的“蘇聯會計述要”例言中一開始就這麼說：“潘序倫所編的會計學教程計分四冊，……第三冊是……國營企業會計概要，本書原是作為這部教程的第四冊而編寫的。……凡修過潘序倫編著的高級商業簿記教程、基本會計學或會計學教科書……的讀者們，如以本書為補充讀物，尤屬相宜。”潘序倫還是要我們學資本主義會計，不但要學他寫的某一本，還要學他寫的每一本。

從上面所舉出的一些事實，我們可以看出右派分子潘序倫寫的會計書籍都是半國地站在資產階級反動立場，他要我們學資本主義會計，走資本主義的道路。

那末，右派分子潘序倫這樣做的目的何在呢？我們再看一看他的自供吧！

潘序倫就在“合併決算表”譯者引言里說：“以後資本主義雖將衰落，但資本仍不能不繼續存在。”我們知道，資本就是資本家用來剝削廣大勞動人民的。潘序倫就是以資本仍能繼續存在，來對讀者宣揚資本主義制度還是要繼續存在的。所



以，在同書的譯者引言里，潘序倫又說：“譯者固知此一會計技術之應用，將永隨資本及其事業之發展而日廣也。”從這句話中更知道潘序倫是怎樣地為資本主義制度永恆不變來辯護了。

由於右派分子潘序倫一貫夢想資本主義復辟，所以對於社會主義制度是痛恨的，並千方百計地進行惡毒污蔑。如在“基本會計學”(495—6頁)上說：“年來世界上某些地區所用貨幣的價值曾經發生了很劇烈的變動，在我國也未能例外。”潘序倫就是這樣污蔑解放初期我們黨和人民政府對於恢復經濟所做的偉大工作以及工作的成效，而把我們的國家說成和資本主義社會一樣。

總上所述，我們不難看出右派分子潘序倫在編寫的會計書籍中一貫宣揚資本主義會計，維護資本主義制度。潘序倫借寫書為名，實際上站在資產階級反動派立場進行反動政治陰謀，那還不明顯嗎？

（許本怡）

## 污蔑和歪曲社会主义會計， 反对社会主义制度

### (一)

潘序倫是偽裝的會計學者。新中國成立以後，他披着偽裝的學者外衣，假借學術活動的名義，出版了大量的會計書本。在這些會計書本中，他肆意地向社會主義進行了惡毒的攻擊。

翻開他寫的會計書本，我們就不難發現，原來在這些書本里，潘序倫主要不是在發表他學術上的見解，而是在提倡他政治上的反動主張。他的政治立場很明顯：一方面竭力為資本主義這個腐朽制度進行辯護，宣揚資本是永恆的，剝削是合理的等等謬論；另一方面則竭力詆毀社會主義，盡力反對和破壞社會主義制度。從他標榜國營企業會計的書本中，我們還不难發現，他根本不是來闡明社會主義會計，而是別有用心地在對社會主義會計加以污蔑、歪曲。他的用意也很明顯，他要他的讀者放棄社會主義思想，信從他的資本主義會計，在會計學的研究上走資本主義道路。一句話，他企圖攻擊和占領會計學這門科學的社會主義思想陣地。

本文要揭發出潘序倫在解放後所寫書本中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反對社會主義會計的若干右派謬論，並專就這一部分作一些初步的分析。

(一)潘序倫攻擊和破壞社會主義制度的謬論。他攻擊和

破坏社会主义制度所用的一个最恶毒的手法就是故意曲解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把社会主义企业和资本主义企业等同起来，混为一谈。且举出几个例来看看：

“企业的组织，就业主的立场来讲，有公营与私营之分。公营企业的业主便是整个国家，或是某一地方自治团体、某一政府机构……”（以上引语见基本会计学第284页，引语中的着重点是本文作者加的，下同。）

“公营企业如由一个政府机构所创设，相当于私营企业中的独资组织，如由几个政府机构联合创设，便相当于私营企业中的合伙组织。事实上有许多公营企业使用公司名义，……公营企业的出资人即政府对于企业债务所负的责任，如不提明为有限或无限，总该认定它是无限。”（基本会计学第285页）

“合作社……可以分为：甲、有限责任合作社，乙、保证责任合作社，丙、无限责任合作社等类。”（基本会计学第285页）

我們注意到，潘序倫在寫以上这些东西的时候（1950年），宪法虽然还未公布，但已经有了共同纲领。共同纲领中规定得很明白：“国营经济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合作社经济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他写的以上这些东西，不仅无视于共同纲领的规定，还狂妄地公开采用旧法观点。共同纲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基本大法，采用旧法观点来替代共同纲领，就是拒绝接受这个基本大法，就是敌视新中国，敌视共产党的领导的具体表现。其次，他抹杀了各种所有制的根本差别，从什么“业主”的立场来划分各种企业，妄图使他的读者们相信，国营企业、合作社和私营企业之间，仅有出资人即“业主”的不同，而无本质上的区别。我们必须指出，实行生产资料

的全民所有制意味着生產資料为創造它們的劳动者所占有，成为社会主义國家的公共財產。在社会主义經濟中，生產資料不再是企業“業主”的資本，不再是資本家所占有的剝削手段。它們为劳动者所掌握和使用，是为人民的利益服务的。因此，在社会主义性質的國营企業里根本不存在什么“業主”。把國营企業說做國家“業主”的企業，是对生產資料公有制最惡毒的攻击，也就是从根本上来詆毀社会主义經濟。

——潘序倫的反動言論还表現为对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攻击。他反对劳动創造价值这一普遍真理，荒謬地主張“利潤是資本的產物”。我們且看，他在講到社会主义國营企業的盈虧時寫道：“盈虧即指資金經企業本身运用后所有增加或減少之數而言。”繼而又寫道：“照會計慣例來講，所謂損益只發生于成品的銷售階段，而不發生于其供应及生產階段。”（以上引語見“國营企業會計概要”修訂本，第104頁和128頁）我們知道，潘序倫在他的會計書本中，一貫地主張國营企業和私營企業除了資金來源有所不同外，兩者并无什么區別。因此，他在这里講國营企業所說的盈虧是資金运用的結果，实际上等于在說資本主义利潤的來源，乃是由于資本家运用了資本。也就是等于在說資本家沒有剝削，資本家取得的利潤乃資本运用所帶來的報酬。根据这种論点加以推演，自然潘序倫也要大叫“定息不是剝削”这种荒謬絕論的反動調子了。其实，不管說“利潤是資本的產物”也好，說“定息不是剝削”也好，其用意只有一个，这就是，企圖为資本主义利潤，或者更确切地說，为資本家的剝削的合法性進行公开的辯护。这种說法，根本否定价值是由劳动創造的。同时，它还企圖推翻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

說。我們知道得很清楚，剩餘價值學說揭穿了資本主義剝削的實質，暴露了資本主義制度中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正因為這樣，這個學說照亮了無產階級革命的道路，成為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的有力的思想武器。潘序倫所宣揚的“利潤是資本的產物”這種謬論徒勞地想掩蓋資本主義剝削的真相，妄圖沖淡兩個敵對階級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理論的猖狂進攻，是企圖從理論上來動搖社會主義制度的極其反動的言論。

我們還要指出，他為了證明他的反動言論，抬出了所謂會計慣例，這也是一派胡說。他所說的會計慣例，是根本不存在的。社會主義會計學的學者們，從來就是承認價值是在生產過程中由勞動創造出來的。沒有生產過程，沒有勞動在生產過程中的作用，就不會有價值。沒有價值，也就沒有價值的增殖，不會有損益。我們在會計上所存在的慣例，只是習慣於在成品銷售之後計算企業經營的財務成果（即損益）。這是因為，在成品銷售之後，我們才有可能用一定的數字正確地計算出實際發生的損益。這種計算，絲毫也沒有暗示損益是發生於成品銷售階段，而不是發生於生產階段的。潘序倫的說法，正好證明他對於會計學的無知，只是他妄圖以他自吹自擂的所謂會計學術，作為他反動言論的掩護而已。這種異常拙劣的手法，只要稍具會計常識的人，也是不難識破的。

潘序倫反對社會主義經濟，還故意歪曲社會主義制度的性質來陰謀破壞勞動人民之間的團結。他在寫出“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之後，接着寫道：“國營企業經濟在基本上已消滅了資本主與勞動者間的对立关系。”（以上引語見“國

“國營企業會計概要”修訂本，第1頁）他混淆視聽，狂妄地把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硬套到社會主義企業的頭上。既然他已知道國營經濟的性質是社會主義的，他必然明白社會主義生產關係。他必然明白，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按其實質來說，根本不同於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在資本主義生產中，勞動者是和資本主對立的。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則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基礎上，勞動者不受剝削，在生產過程中實行同志合作和社會主義互助，產品的分配是有利於勞動者本身的。他明知這樣，然而他却偏偏說，在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企業中“基本上消滅了資本主與勞動者間的对立關係”。在他言下，“对立關係”僅僅是基本上消滅，那末當然還未完全消滅，而這種關係，竟還是“資本主與勞動者”間的關係！真是狂妄透頂，荒謬絕倫！很明顯，這是他妄想煽動勞動人民起來反對國營經濟，是針對社會主義制度所施放的一支毒箭。

潘序倫在講到國營企業經營資金來源的時候，說道，國營企業可用“延期支付職工工資”的方式，“以補充其自有資金之不足”。（“國營企業會計概要”修訂本，第7頁）這種說法，實質上是他上述謬論的發展。我們知道在資本主義企業里，資本家剝削勞動者是多方面的，不擇手段的。延期支付職工應得的工資，正是剝削的方式之一。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企業，絕不會有這種行為。在國營企業中，只是因為工資結算方法的關係，只是因為企業不可能每天把工資結算付清，才有一部分應付工人和職員的工資，經常參加企業資金的周轉額，構成了“視同自有流動資金”。因此，國營企業絕不是用延期支付工資的方式，作為自有資金的補充手段。潘序倫在說到這點時，故

意曲解。这种說法，顯見得是引伸了他“國营企業中存在对立关系”这一荒謬論点。他运用这种說法，企圖引起广大职工群众的不滿，陰謀从人民內部來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潘序倫在說到國营企業的企业獎勵基金时，先用譏諷的筆調寫道：“我國國营企業的生產条件，在目下还不能算是那么良好，生產、銷售、財務計劃，在这恢复或新建时期，也不見得会定得怎样的正确。企业职工如能完成其獲取计划利潤(或維持其计划虧損)的任务，也算是一件难能可貴而值得獎勵之事了。”(“國营企業會計概要”修訂本，第139頁)他对社会主义计划經濟的輕蔑的神情，如此躍然紙上，使我們看到这里，仿佛也看到了这个前伪經濟部長鄙視人民經濟事業，不屑一顧的一副丑惡嘴臉。資產階級的御用学者們，在无法駁倒我們计划經濟的优越性时，总是用計劃訂不好，訂不正确等流言蜚語來肆意攻击。潘序倫就是这一类人中的一个。去年他在上海政协会議上又大事叫囂，要求統計因計劃錯誤而造成的損失，借此來污蔑和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正是这种陈詞濫調的一貫表現。

关于國营企業企业獎勵基金，他在譏諷之余，又对前政务院財政經濟委员会公布的企业獎勵基金提用办法(1952年1月15日公布)，作了别有用心曲解。查这项办法，对各类企業从利潤中提留企业獎勵基金百分率的高低，有明文解釋。办法中說，百分率的高低，是根据不同企業的不同劳动强度和影响职工健康程度以及提高生產定額和降低消耗定額的可能性來規定的。他在寫書时，顯已看到了这个文件。然而他偏偏惡意曲解，說道“对于职工的生命和健康具有相当危險性或影响的重工業”百分率最高，“对重工業中比較安全輕便各業……

及輕工業中比較辛苦不安全各業”百分率次之，“工作比較輕易的輕工業”百分率最低。（以上引語均見“國營企業會計概要”修訂本，第139—140頁）我們必須嚴正指出，潘書中這段文字，對提高生產定額和降低消耗定額的可能性避而不談，而妄自添上“安全”、“不安全”乃至“生命危險”等字句，不僅是對我人民政府法令的極度藐視，而且還是對職工感情的惡毒挑撥。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從來是十分重視生產安全、勞動保護的。我國工業企業，在解放以後莫不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之下，大力進行了安全生產的宣傳教育，採取了許多勞動保護的具體措施，增添了設備，建立了檢查制度等等。潘序倫抹煞了這些事實，妄稱有不安全的企業，有工人操作要冒生命危險的企業。照他說來，翻身了的工人竟還要冒着生命的危險，從事不安全的操作，好像國營企業比之剝削職工血汗的資本主義企業並沒有什麼區別。可見這也是直接製造職工不滿，挑撥離間，蓄意進行破壞的惡毒言論。

潘序倫在他書本中攻擊和破壞社會主義制度，不僅象以上所說的以職工為對象，歪曲事實，盡力製造不滿而已，他還鼓動投機，企圖擾亂社會的經濟秩序。在講到企業中多餘的資金時，他寫道：“這項多餘的資金若听其呆存于低利的銀行活期存款，不如暫時設法予以利用，購些買賣轉讓極其便易的有價證券，以獲取較高的利益。”（“會計學教程”第二分冊，第183頁）看來，這位“經濟學家”，倒是投機倒把的能手！人民的金融事業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重要一環，把錢存入人民銀行，間接支援建設事業，也是一種愛國行動。這種起碼的經濟常識，在潘序倫不會不知道，可是他却教唆讀者不要把錢“呆存”于



銀行，要把多余資金，放入投機市場去買賣證券，興風作浪。這是他從擾亂社會主義經濟來反對和破壞社會主義制度的策劃，陰謀使我們的經濟生活不得安定，經濟建設受到挫折，不能夠穩步前進。當然，他的陰謀是不會得逞的。然而他惡毒的策劃，則在書本中已暴露無遺了。

(二)潘序倫反對社會主義會計的手法。潘序倫的反動政治立場，表現在會計學的闡述和研究上，就是反對社會主義會計，反對會計學走社會主義的道路。從他的一些所謂會計著述中，我們看到，他反對社會主義會計主要是從兩方面入手的。第一，他製造和宣揚“新民主主義會計”，用它來堵塞會計學走向社會主義的通路，並繼續為他的資本主義會計找尋市場。第二，他公開地、大量地採用資本主義會計的論點來闡述社會主義會計，用偷天換日的辦法妄圖使資本主義會計長入社會主義會計。

潘序倫套用了共同綱領上的語句，從五種經濟成份中推論出所謂五種“會計成份”，然後把它們湊合起來構成了他的一套所謂“新民主主義會計”理論。他寫道，一部會計學教程“必須使它能包括五種的會計成份，即：(1)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企業會計；(2)具有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社會計；(3)農民及手工業者的個體會計；(4)具有國家資本主義性質的公私合營企業會計；及(5)仍具有私人資本主義性質的私營企業會計。”(“會計學教程”第一分冊前言，第1頁)根據這套理論，他於是編寫了“會計學教程”、“國營企業會計概要”和“蘇聯會計述要”等幾本書，儼然自成體系。在這個荒謬的體系中，他公然以資本主義會計作為骨干，使社會主義會計退居于從屬、次

要的地位。無論從這幾本書的篇幅或者內容來看，這樣的論斷都是無可爭辯的事實。就是他自己也明白承認這一點。他說“國營企業會計概要”一書，是作“為已經習過私營企業簿記會計的讀者們作補充讀物之用”的。（“國營企業會計概要”修訂本例言）

我們再看，在他的所謂“新民主主義會計”中，對於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企業會計和具有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社會會計，他又怎樣荒謬地來解釋的。關於國營企業會計，他說，從“國營企業來看，因它們要與私營企業同樣繳納工商業稅，又因產品供銷計劃在某些國營企業還不能徹底實施，還不能不在具有一些競爭情況的市場中活動，因之它們所用的會計原理與方法還不能完全脫離資本主義會計的形態。”（“高級會計學教材”序言第2頁）關於合作社會會計，他說，“合作社簿記或合作會計等名辭，只可說是淨值會計的一支。”（“高級商業簿記教程”序言，第3頁）照他的說法，社會主義會計脫離不了資本主義會計的形態，而半社會主義性質的會計又不過是資本主義會計中的一股支流，那末很明顯，構成他新民主主義會計的所謂五種“會計成分”中，碩果僅存者，只有資本主義會計一種而已。其實“新民主主義會計”不過是他玩弄的一種手法，他真正的意思是只承認有資本主義會計，不承認有社會主義會計。

我們知道，會計學是一門具有鮮明的階級性的科學。在一定的社會經濟形態下，它是為一定的經濟基礎服務的。在資本主義社會，會計成為幫助資本家進行剝削的工具之一，而在社會主義社會，它必然要為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生產關係而發生作用。我們又知道，我國新民主主義社會是屬於社會主義體

系，逐步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具有过渡性质的社会。在过渡时期，居领导地位的是社会主义经济，而绝不是资本主义经济。资本主义经济要通过社会主义改造而逐步归于消灭。因此，在过渡时期，作为上层建筑的会计学，决不可能是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会计的所谓“新民主主义会计”，而必然是社会主义会计。

由上可知，潘序伦鼓吹的“新民主主义会计”，实质上乃是他反对社会主义会计的一种饰词。

他反对社会主义会计的另一手法是在讲到国营企业会计时，尽量用资本主义会计的观点来解释，或者硬把它们等同起来。这种歪曲社会主义会计的说法，在他的“著述”中是不乏例子可寻的。特别是在他的“国营企业会计概要”一书中，几乎俯拾皆是。例如：

“国营企业的自有资金及其积累同是属于全体人民或劳动大众所有，所以没有给予区分的必要……不妨把自有资金及积累併成一类，而称之为净值。”（“会计学教程”第一分册，第155页）

“严格地说；所属投资……这个科目乃是企业对所属企业或机构的资金统制科目。”（“国营企业会计概要”修订本，第56页）

“国营企业各种定额资产的会计处理，基本上与普通会计中所讲这些资产的处理方法并无不同。”（“国营企业会计概要”修订本，第86页）

说国营企业的“会计记录要在能正确表现一个企业的资产负债状况。”（“国营企业会计概要”修订本，第93页）

“國營企業會計事務的處理程序，如與一般私營企業會計事務的處理程序相比較，在大體上可說是相同的。”

（“國營企業會計概要”修訂本，第175頁）

以上所舉出的，不過是他這一類謬論的一部分而已。但就憑這些例子已足證明，他裝着在闡述社會主義會計，實際上他所推崇的還是一套腐朽的資本主義會計觀點。這些例子也證明，關於會計學要走什麼道路的問題，他是態度堅定，愛憎分明的；他對於資本主義會計是愛護備至，對於社會主義會計則抗拒惟恐不力。

隨着社會經濟基礎的改變，會計的目的、任務、對象和方法都跟着發生根本性質的改變。社會主義會計與資本主義會計有着根本的區別。先拿任務來說，社會主義國營企業會計的任務，主要在於反映和監督計劃的執行情況，保護社會主義財產，從而保證經濟核算制之得以鞏固和貫徹。它絕不是象資本主義會計那樣“要能正確表現企業的資產負債狀況”。資本主義會計為了滿足資本家的要求，確實以編制資產負債表列作首要的任務，因為資本家所關心的，除了他們剝削收入以外，就是他們剝削手段——資本的消長變化。社會主義會計也要編資產負債表，但是，這是作為一種會計的方法來使用的，通過資產負債表來檢查和分析企業完成計劃的程度，借以發掘企業生產的潛力。再拿方法來說，社會主義國營企業會計有嚴密的會計組織，要編制有統一格式的會計報表，會計事務的處理是嚴肅、及時，並且力求正確的。所有這些，和資本主義會計方法上的混亂、虛假，各自為政等相比較，絕不是什麼“大體相同”，而是有着根本的差別。就以各種定額資產的會計方法來

說，社会主义會計中按定額來計算和考核企業流動資金的運用情況，以計劃成本來處理日常的會計記錄，要計算和反映定額和超定額的短缺等，這些都是資本主義會計（潘書中所稱的普通會計）中所沒有的內容。以上這些說明了，實際上在社会主义會計與資本主義會計之間存在着本質的差別。然而潘序倫竟說，兩者的任務和處理方法“基本上”“并無不同”。由此可見，他在標榜社会主义會計的花招之下，實際乃是販賣私貨，宣揚着資本主義會計。

他把國營企業會計中的所屬投資說成“資金統制科目”。他的意思是說，國營企業和所屬企業或機構間的關係乃是壟斷資本的股權公司和附屬公司之間的關係。他主張國營企業的自有資金和積累“不妨”“併成一類”，“稱之為淨值”。他的意思無非是說，國營企業乃國家當“業主”，和私營企業的獨資經營并無區別。這些說法都套用了資本主義會計的觀點，歪曲了社会主义會計。不僅如此，這些說法還把國營企業和資本主義企業等同起來，也污蔑了社会主义性質的經濟。

我們必須指出，不顧事實，硬把資本主義會計觀點套用到社会主义會計頭上，或者硬把兩者等同起來，乃是企圖取消社会主义會計，企圖以資本主義會計來取而代之的資產階級復辟陰謀。

（三）堅決保衛社会主义會計的思想陣地，粉碎右派分子的陰謀詭計。從以上談到的一些問題來看，潘序倫在他會計書本中所積極從事的，顯然是在宣揚資本主義，攻擊社会主义。他利用會計書本，積極反對社会主义制度、反對社会主义會計乃是毋庸置疑的事實。

这个事实說明了，潘序倫在去年大肆攻击共產党的領導，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叫囂反对苏联，反对社会主义改造，大量散布右派謬論，决不是偶然的事情。他所寫會計書本的荒謬內容和他几年來一系列的右派言行，是有着密切联系的；如果我們把这方面的謬論联系起來看，他的右派面目，就更加暴露无遺了。这是他解放几年來，拒不進行改造，一貫地坚持他資產階級反动立場的必然結果。

这个事实指出了，他會計書本中的問題，并不單純是一个學術性的問題。他在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不要推广和發展社会主义會計这些帶有根本性質的問題上，抱着根本和我們不同的态度。这完全是一个政治立場問題。他站在他反动的資產階級立場，企圖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取消社会主义會計，千方百計地为資本主义制度和資本主义會計辯解，妄想証明剝削是合理的，資本主义會計观点可以适用于社会主义企業，我們的态度与他完全相反，我們坚决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不斷發展社会主义會計。我們會計工作者决心要保衛我們社会主义會計的思想陣地，我們要坚决駁斥这些右派謬論，粉碎他們的陰謀詭計。

（婁尔行）

## （二）

經過了多次的揭發和批判，右派分子潘序倫的反动面目已經進一步暴露在我們的面前。他的反动言行，不僅是出現在1956—1957年之間政協和民盟的各次小組会上和其他的一切場合里；而且早已表露在他所寫的會計書本当中以及他所

作的演講當中。他是一貫地、牢固地站在反动立場，時時刻刻懷抱着變天復辟思想，不斷地向黨、向人民、向社會主義事業口誅筆伐，猖狂進攻。因此，對於這樣的一個右派分子來講，我們應該加倍警惕，對他作堅決的無情的鬥爭。

我們知道，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是水火不能相容的。潘序倫既然要為資本主義制度辯護，就必然要反對社會主義制度；他既然要宣揚資本主義會計，就必然要反對社會主義會計。

這裡就他反對社會主義會計部分進行揭發和批判。

潘序倫在1951—1952年之間曾寫了一套所謂“會計學教程”，共有四冊。除了第一、第二兩冊私營企業會計部分還在明目張胆地宣揚資本主義會計以外，第三冊名為“國營企業會計概要”，第四冊名為“蘇聯會計述要”。從表面看來，好像潘序倫已經改變了他的態度，居然也來研究社會主義會計了，而且已經為社會主義會計的傳播來服務了。但實際上卻大謬不然。潘序倫之所以這樣做，正是他一個迷人的幌子，是一張迷人的畫皮。只要剝開他的畫皮一看，就知道他是在那裡“掛羊頭賣狗肉”，披着社會主義會計的外衣，偷運資本主義會計的私貨。

現在分三個部分來談：

(一)潘序倫對待社會主義會計和資本主義會計的基本態度究竟怎樣。為了揭開潘序倫這張迷人的畫皮，首先讓我們來看看潘序倫對待社會主義會計和資本主義會計的基本態度究竟是怎樣的。從他的基本態度上，就可以看出潘序倫真正喜愛的是什麼，仇視的是什麼；真正擁護的是什麼，反對的又是什麼。

潘序倫在這套“會計學教程”第一冊的前言中替大家安排

下一个進修會計的“应有步驟”，那就是先学資本主义會計，再学社会主义會計。他在“苏联會計述要”一書的例言中，甚至把苏联社会主义會計作为讀过資本主义會計以后的一种“补充讀物”。潘序倫提出这样一种荒謬的論調，也絕不是偶然的。是受他那反动立場和反动思想所指導的。在他的头腦中牢不可破地認為資本主义會計是“正宗”，是“基礎”；而社会主义會計只不过是資本主义會計的“基礎”上所發展出來的一個“旁支”。他曾在另一本“高級會計学教材”第一分冊的序言中这样露骨地表示过，他說：“假如象有些人所主張的那樣；把原在高級會計学中所討論的这样那样一一予以刪節揚弃，这一課程的內容豈不要成为空无所有？”由此可見，在潘序倫的心目中，只有資本主义會計，沒有社会主义會計。在他看來，只有資本主义會計中的这样和那样才是丰富多采的，舍此以外，就別无所有了。这就是潘序倫对待社会主义會計和資本主义會計兩種絕然不同的基本态度。

不僅如此，潘序倫的基本态度还可以从上面所提到的那本高級會計学教材序言的另一部分得到進一步的証明。潘序倫在那篇序言的第一頁中會假惺惺地提出这样一些問題，他說：“这本高級會計学的寫作，究应以……社会主义社会所适用的會計理論和方法为討論研究的对象呢，还是以社会主义會計及資本主义會計为共同对象呢？”“假如以社会主义會計及資本主义會計为共同对象，則应着重于社会主义會計而略及于資本主义會計呢？还是資本主义會計与社会主义會計同时并重而不偏廢呢？”他提出了这一系列的問題以后，于是就曲曲折折、轉轉彎彎地來了一大套所謂“論究”。可是說來說



去的結果究竟是怎樣呢？結果他不但以社會主義的國營企業會計和資本主義的私營企業會計相提並論，作為共同的對象，而且特別偏重資本主義的私營企業會計。他的主要理由就是認為國營企業“所用的會計原理與方法還不能完全脫離資本主義會計的形態”；並且還認為“假如我們寫一本高級會計學而只以國營企業為對象，那就成為一本國營企業會計制度而無所謂會計理論的研究了”。

講到這裡，我想大家對於潘序倫對待社會主義會計和資本主義會計兩種絕然不同的基本態度已經是非常清楚了。

潘序倫的立場是非常堅定的，他的態度也是非常分明的。他真正喜愛的是資本主義會計，仇視的是社會主義會計；他真正擁護的是資本主義會計，反對的是社會主義會計。

(二)潘序倫用什麼手法來排斥社會主義會計的。潘序倫的基本態度是仇視社會主義會計，反對社會主義會計的，但老奸巨滑的潘序倫在表面上還不敢公然地表示反對，却在暗地里施放毒箭，玩弄隱蔽手法。因此，我們切不可為他虛假的現象所迷惑。

潘序倫所慣用的隱蔽手法就是偷天換日的迷人手法，他企圖用這樣的手法偷偷地用資本主義會計來替代社會主義會計，從而排斥社會主義會計。這一手法的具体表現主要有兩種：

第一種是“混同法”。他在“國營企業會計概要”修訂本的第5頁上說：“我們可以說，國營企業會計是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會計，但它並不就是‘社會主義會計’。”在“會計學教程”第1冊的前言中又這樣說：“使這兩冊所講的私營企業會計成

为新民主主义會計中所包含的私营企業會計，而不再是資本主义社会中的私营企業會計。”在前面所引的一句話里，他把國营企業會計說成不是社会主义會計；在后面所引的一句話里，他又把私营企業會計說成不是資本主义會計。請注意，就在这兩句話里，他就輕輕地使國营企業會計和私营企業會計变了質，同时也使國营企業和私营企業变了質。他这样說的用意何在呢？很明顯，他是想把這兩種本質上完全不同的东西混同起來。他企圖使大家相信，在过渡时期中，不管是國营企業會計也好，不管是私营企業會計也好，既不是社会主义會計，又不是資本主义會計，它們之間並沒有什么根本上的区别，因而可以不分彼此，并駕齐驅。如果用他自己的話來說，那就是應該“互相配合，不相冲突”。（“國营企業會計概要”修訂本，第5頁）这就是他所使用的“混同法”。

第二种是“等同法”。潘序倫不但把社会主义會計和資本主义會計混同起來，而且还進一步把它們等同起來。这样他就偷偷地用資本主义會計來代替社会主义會計，从而把社会主义會計排斥出去。例如，他在“高級會計学教材”的序言中說：“我以为有很多的會計原理与方法是同样可以适用于國营企業和私营企業的。”他在“國营企業會計概要”修訂本175頁中也有同样的論調，他說：“國营企業會計事務的处理程序，如与一般私营企業會計事務的处理程序相比較，在大体上是相同的。”不僅如此，甚至对于苏联的會計他也想用“等同法”与資本主义會計等同起來。例如，他在“苏联會計述要”一書的例言中說：“有些比較普通的會計原理和方法，如借貸法則、过帳方法及有些帳簿报表的格式和編制方法等等，因与我國普通

簿記、會計書籍所述者基本上相同，本書也概從簡略。”（請注意，這裡所謂我國普通簿記、會計書籍，就是指過去傳播資本主義會計的那些書籍。）最荒謬的是，他還在“蘇聯會計述要”一書中舉一些被他所歪曲了的例子來證明他所說的“相同”。例如在“蘇聯會計述要”的第41頁和第56頁中，把蘇聯憑證整理單核算形式中的憑證整理單硬說成就是我國會計實務上所用的傳票或總傳票；把蘇聯先進的憑單日記帳核算形式中的憑單日記帳（當時譯為分日記帳）硬說成就是一般會計書籍中——也就是資本主義會計中所說的特种日記帳。這不但是驢頭不對馬嘴，而且也是極大的污蔑。除此以外，潘序倫用“等同法”來迷人的地方還有很多，這裡只不過舉幾個例子而已。

大家都很清楚，會計核算是為一定的經濟基礎服務的，它不僅是受歷史條件所制約，而且在社會發展的每一個階段上都具有鮮明的階級性。因此在不同的社會經濟制度下，核算的對象、任務和方法等都各有不同。如果把社會主義會計與資本主義會計比較起來，不僅存在着根本的區別，而且前者比後者具有無比的優越性。潘序倫企圖用資本主義會計來偷換社會主義會計，從而排斥社會主義會計，是絕對不能容許的，不管他的迷人手法如何巧妙，也是欺騙不了人的。

（三）潘序倫的問題究竟是犯了學術上的錯誤還是犯了政治上的罪行。我們說，潘序倫的問題絕不是什麼學術上的見解錯誤，而是政治上的嚴重罪行。別的且不講，就拿他反對社會主義會計這件事而論，就足以證明這一點。這裡可分兩點來談談：

第一，我們知道，社會主義核算與資本主義核算之所以有

根本的區別，以及社會主義核算之所以優越於資本主義核算，歸根結蒂是由於兩種不同的社會制度所決定的。如果對於兩種社會制度的根本區別以及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採取否定態度的話，那末就不可能承認兩種核算的區別和社會主義核算的優越性。誠如大家已經揭發的，潘序倫是一貫地、堅決地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因此，他反對社會主義會計就成為必然之事。不僅如此，潘序倫之所以反對社會主義會計，其主要目的，還是在於反對社會主義制度，他反對社會主義會計只不過是他為了要達到反對社會主義制度這個目的所用的一種手段罷了。因此我們與潘序倫的根本分歧，絕不僅僅是贊成什麼會計，反對什麼會計的問題，而是擁護和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問題，是政治上的立場和道路的問題。

第二，必須指出，當潘序倫着手編寫他一套所謂“會計學教程”的時候，新中國會計的發展方向和應走的道路已經是非常明確的了。例如早在1951年1月份出版的“新會計”雜誌的創刊號中已經發表了中國人民大學邢、黃兩同志所寫的一篇論文，題為“怎樣建立新中國會計理論基礎？”在這篇文章里批判了資本主義的會計理論，並指出了新中國會計改造基礎與前提，那就是建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政治經濟學基礎上的社會主義的會計理論。以後該刊又連續發表了關於這一方面的文章，總計不下十多篇，中間曾一度引起一些不同意見的爭論，但是真理愈辯愈明，結果大家一致認為必須堅決肅清資本主義的毒素，走社會主義的道路。當時無論學術界和教育界都已轉變了方向，並掀起了向蘇聯學習的高潮。唯有潘序倫，堅守他的反動立場，不但在他所寫的“會計學教程”中繼續宣揚資

本主义會計，并且还用种种隱蔽的手法來排斥社会主义會計，他反对向苏联學習，企圖使大家迷失方向，把大家拉回到資本主义的道路上。这难道还不是潘序倫在政治上的一种陰謀活动嗎？

由此可見，我們今天所以要向潘序倫作坚决斗争的，絕不是什么學術上的問題，也不是什么認識上的問題，而是政治上的大是大非問題，也就是兩個立場兩條道路的斗争問題。

（余性元）

## 撕去潘序倫偽裝學者的外衣

右派分子潘序倫一向以“會計學者”“會計專家”自我標榜。就是在幾次交代中，他還把自己描繪成爲一個“會計專家”。潘序倫是不是一個會計專家呢？大量揭發的事實說明，潘序倫根本不是專家，而是一個偽裝的學者。這個曾經盤踞在會計學界，由會計師起家，編寫過大量會計書籍，辦過會計學校，還搞了一個立信會計圖書用品社，並且和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勾結在一起的市儈政客，利用他的所謂“立信會計事業”，把自己打扮成爲一個“會計學者”，的確很容易迷惑人。那末現在讓我們來剝開他的外衣，看看他是用什麼方法偽裝起來的，看看他的真面貌究竟是什麼？

首先我們必須指出，潘序倫之所以搞“立信會計事業”，是有他的政治目的的，這一點連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認。他交代說：“在解放前我以剝削和幫助資本家剝削起家，用巧取豪奪不擇手段的方式創辦了“立信會計事業”。我以“立信會計事業”爲政治資本，走上了反動政治舞臺。我同時做自由職業者、做生意、做官、辦學、寫書。我有了政治勢力，再用政治勢力來發展鞏固我的立信事業，因而能在舊社會中達到了壟斷我國會計事業的目的，爲官僚資本和帝國主義的反動統治服務。”

潘序倫十分明白，他爲了要博得反動派的賞識，僅僅依靠會計師的招牌是十分不夠的。因此，爲了充實他的政治資本，

他就利用寫書、辦學校、辦出版社，通過這一系列的活動來抬高他的社會地位，以達到他攀上反動政治舞台的目的，在這一方面他也的確盡了“巧取豪奪、不擇手段”的能事。

我們現在首先來看看他在寫書這一方面的丑惡行為。

潘序倫在“公司會計”的序中說：“像我這樣拋開了書本，整日在市儉中間討生活的人，那里能夠寫出好的書來。”的確，整日在市儉中間討生活的潘序倫並不是真正要搞學問。我們这里要着重指出，以潘序倫名義編、著、譯的書籍，絕大部分根本不是潘序倫寫的。

我們只要隨便舉幾個例子，就可以說明這個問題。

潘序倫最早的一本所謂“重版數十次、行銷近百萬冊”的這本“高級商業簿記教科書”，就是吳君實、顧詢等人寫的，但是編著者卻變成了潘序倫。

潘序倫解放前最主要的一本書——會計學（分出四冊），也不是潘序倫寫的。在這本書的原叙中最後這樣說：“本所（接：立信會計師事務所）編輯部同人王君澹如、陳君文麟、李君鴻壽、黃君組方、施君仁夫、唐君文瑞、顧君哲云、沈君懋平等，或為搜集材料，或為草擬初稿，或參討論之役，或任校讎之事，或演習題之詳解，蓋非同志之助，此書將永無完成之日。”本書從搜集材料起，到草擬初稿，一直到校對、到做習題詳解都是別人的勞動，而編著者竟是潘序倫的名字。

潘序倫十分得意的一本書“公司會計”是王澹如寫的，但是出版的時候竟變成了潘序倫編著、王澹如助編。這本“公司會計”後來由他事務所里的一位職工改編為“股份有限公司會計”，也終於竊據為他個人的著作了。

解放前，他經常吹噓的那本“勞氏成本會計”，是由他的一個學生集合其他三個同學翻譯的，翻譯後由他略為付給幾個稿費，就以自己的名字出版了。

這裡不必再一本一本的來加以列舉，因為數量實在太多。總之，我們過去經常看到的一些會計書本，無論封面上寫的是潘序倫編，或者是潘序倫著，或者是潘序倫譯，或者是潘序倫編著或編譯，或者是在別人的名字頭上再加了一個潘序倫，總而言之，實際上這些書的絕大部分都是潘序倫的“巧取豪奪”，都是潘序倫盜竊別人的勞動成果。所以，盜名竊譽是潘序倫偽裝學者的手法之一。

潘序倫的第二個手法就是抄襲剽竊。

這裡舉兩個例子。

例子之一是“國營企業會計概要”(1951年11月版)的第二章共24頁，其中抄錄自會計制度的共達22頁，竟占全章的92%以上。

例子之二是“基本會計學”一書中的第20章“分部會計”，第23章“製造業會計”，第24章“永續盤存制度”，第29章“決算表的分析”，就是分別從斐南“會計學原理”(1948年第三次改訂本)的第27章、22章、29章和第30章抄來的。此外全書明抄和暗抄斐南會計學原理和裴登會計學概要的地方很多。

潘序倫十分得意的是“基本會計學”的第30章“會計的基本理論”，在香港立信會計專科學校的“立信會計月刊”第15期(1951年1月1日)“讀了‘基本會計學’後”一文中，曾稱它是“中國會計界劃時代的新理論。”但是這些並不是什麼新奇的东西，我們只要略加查對，就可以發現其中絕大部分就是從裴



南的“會計學原理”和裴登的“公司會計準則緒論”中抄來的。潘序倫所抄襲的就是美國資產階級御用學者凱斯脫爾、斐南、裴登等那一些貨色。

潘序倫的第三個手法就是粗制濫造。

他一方面是輾轉抄錄。將同一內容的東西在這本書那本書抄來抄去的抄。例如解放前潘序倫將其所編的“高級商業簿記教科書”的“支店簿記”一章（1939年修訂本是第34章）轉抄，並補充為“會計學”的“支店會計”（1948年修訂本是第24章），解放後又將會計學的“支店會計”略加改編而成為“基本會計學”的“分店會計”（1950年初版第21章），其後又調節而成為“高級商業簿記教程”的第25章“分店簿記”。又如解放後編著的“會計學教程”則是由“高級會計學教材”第一分冊的有關各章和“基本會計學”的第20章“分部會計”、第24章“永續盤存制度”、第26章“會計科目的分類和編號”等拼湊而成。再如“基本會計學”14—16章即“購貨銷貨事項的管理”、“現金和銀行往來的處理”、“單據的處理和記錄”，基本上是抄自“會計學”的第15章“購貨與銷貨之實務”、第17章“現金和銀行往來的處理”，以及第18章“單據的處理”（1948年修訂版）。

即使是號稱“重版數十次”的“高級商業簿記教科書”，事實上前後也是極少變動。如以其1951年3月修訂後十四版與其1936年版相比較，一在解放以後，一在抗日戰爭以前，而原封未動部分，竟達90%以上。從這裡也可看出潘序倫粗制濫造對讀者所抱的絕不負責的態度。

潘序倫粗制濫造的另一方面就是將一本書改頭換面而變成另一本書。例如將“會計學”調節而成為“會計學教科書”（原

称高級會計学)、將“審計学”節編而成为“審計学教科書”,將翻譯的“勞氏成本會計”節編而成为“成本會計学教科書”等。不但在解放前是如此,就是在解放后也是如此。例如“簡易商業簿記教程”就是从“高級商業簿記教程”刪節而成的。又如將“勞氏成本會計”刪節,另成一本“初級成本會計”。

潘序倫的第四个手法就是自我吹嘘。

首先,他厚顏无耻的宣稱自己的書是独一无二的。例如“基本會計学”編輯例言中說:“我想學者讀了這一本書,可能不再在這一科目方面另讀第二本書。”“这样,修畢了本書的人們如果就業,已獲得了足敷一般应用的會計知識与技能。”又如他在“簡易商業簿記教程”的序中說:“簿記的學習現在已普及到小城市及鄉村里的一般職業青年和城市中的一般家庭婦女。……所以应為他們編纂一册程度比較淺近內容比較簡單的教本,希望他們一讀即能了解。”又如他在“通用簿記教程”的序言中說:“我們久想編著一部程度虽淺而包羅較廣的簿記教程,使廣大的人民可靠它獲取這項应用机会非常普遍的生活技術。這項工作直到現在才算初步告成。”

其次,为了擴大他的書的銷路,你讀他的這一本書,他还劝你讀他的另一本書。例如“本編应与原著作人之高等會計学其他各編同讀,讀过本編后,續讀其他各編,讀过其他各編后,再讀本編,最好能兼讀會計准則一書(按:亦系潘序倫譯)方能獲得徹底了解。此編如已徹底了解,則对于財務會計一科,可謂已窺全豹。”(“決算表之編制”譯者序言)。

再次,他不但要讀者讀他已出版的書,而且他还要讀者注意他尚未出版的書。例如,“我等正拟繼續另寫一本國營企業

成本會計概要，以便學者可以繼續這本書而修習。”“國營企業會計概要”臨時版例言）又如在“會計學教程”前言中說：“至于‘國營企業會計概要’一書對於國營企業會計的敘述，原是很簡略的。……好在內容比較新穎、詳備的國營企業會計，不久將另有出版，有志進修這項課程的讀者當不愁無書可讀。”可是事實上這完全是欺騙，這兩本書根本就沒有出版。

此外，他還刊印了所謂“臨時版”、“油印本”等，宣傳推廣，甚至及于香港。在“所得稅原理及實務”一書中，還登了立信會計師事務所的广告，作為附錄。

從上面這些事實來看，可見潘序倫就是這樣偽裝起來的一個偽學者。

或許有人會問：既然潘序倫是這樣的一個偽學者，那末是不是說潘序倫在會計上就沒有什麼見解，因而也就說不上他在這一方面的反動？顯然，決不能這樣來理解。我們說潘序倫是一個偽學者是因為他不擇手段，侵占別人的勞動成果，以此作為他爬上反動政治舞台的墊腳石。但是儘管如此，絲毫也不意味着潘序倫對於會計就沒有他自己的見解。潘序倫對於資本主義會計是竭力加以推崇和宣揚的，這在潘序倫自己所寫的一些序言中可以明顯地看到。這些序言不就很系統地表達了他的反動思想嗎？而且，這部分由別人所寫而被他據為已有的書，當然要按照潘序倫的見解和符合潘序倫的要求，否則潘序倫是決不會允許它出版的。因此，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出在所有的這些書中是始終貫徹着潘序倫的反動主張的，只不過是在手法上由他借手別人的勞動以達到他走上反動政治舞台的目的而已。解放以後，潘序倫似乎也自己動手來寫幾本書了，

但也正由于这样，他就更恣意和猖狂地散布他的反动謬論，向党 and 人民進攻。这也說明了他的反动思想的一貫性和坚决性。所以我們如果把潘序倫在解放前和解放后的言論行动联系起来看，把他的这些書中的論点貫串起来看，潘序倫在會計上的反动性是昭然若揭的。在揭穿潘序倫伪装学者的同时，絲毫也不能忽視潘序倫在會計思想上的反动性。

潘序倫常常說这样一句話：“学校养書，書养学校。”学校养書是什么意思呢？潘序倫粗制濫造了这么多書，如果沒有人肯出，出了又沒有人買，那也是枉然的。因此他就必然要办出版社自己來出書；自己办学校，利用学校來推广他書的銷路。自己办出版社，不但自己可以随意出書，而且还可以利用出版社与別人競爭來進行壟斷。称为剝削大师的潘序倫的确在書上賺了不少的錢。“書养学校”从表面上看来好像很堂皇，似乎在書上賺來的錢，把它用之于学校，來培养人才。但是實質上潘序倫的所謂書养学校，是叫他的职工寫書，版稅归之于学校，而学校是把持在潘序倫手里，所以版稅归学校也就是归潘序倫。他就是利用这样的手法來進行剝削。潘序倫办学校一方面推銷了他的書，同时也推銷了立信會計圖書用品社的帳簿表冊，另一方面还替他招徠會計師業務。他曾經說过：“十年以后，这些学生不是經理就是厂长。他們要請會計師，不請我們立信，还請什么人？”潘序倫还非常乐意立信的学生到他事务所實習，因为替他做了工作，他可以不必給錢。他曾經說过：“預备以會計師为職業者，欲求得會計師之經驗，最好在著名之會計師事務所中實習二年至三年，僅在一企業机关或公務机关中實習，則事倍而功不逮半。”（潘序倫：“中國會計師業的

过去与今后”，新中華雜誌第二卷第一期)另外，潘序倫還有一個十分刻薄的手法，就是叫剛畢業的學生到他那里工作，在試用期間當然是最低的工資，到試用期滿他就把你趕走了。他在錄用青年職工時，常常對他們這樣說：“你們年紀還輕，要多經歷經歷，我這里待遇雖然較低(實際上是低極)，但是你們晚上還可以改改課卷，或在補校教教書，也就與一般差不多了。”他就用這種手法，極盡剝削之能事，那里有絲毫“學者”氣味。

當然，潘序倫決不僅僅是為了賺錢。他寫書，辦出版社，辦學校，還有他的政治目的，潘序倫就是要利用它們把自己偽裝成一個學者作為他爬上反動政治舞台的階梯。所以書養學校也好，學校養書也好，實際上書也是養潘序倫，學校也是養潘序倫，潘序倫從書養學校，學校養書中既賺了錢，又賺得了反動的政治資本。

這樣說，並不是沒有根據的。因為：

如果不是這樣的話，又怎樣來解釋在解放前他的學校要以反動頭子陳其采(是特務頭子陳立夫、陳果夫的叔叔)，戰犯王云五來做董事長？為什麼立信會專的圖書館要稱為“謫士圖書館”(按：謫士即陳其采)？為什麼王云五在偽行政院院長不做以後要將他的圖書存放在立信會專？

如果不是這樣的話，又怎樣來解釋在解放前他要迫害學校中的進步學生？在解放後在共產黨領導下又為什麼要先後辭掉三個學校的校長職務而不願再干呢？

如果不是這樣的話，又如何來解釋解放以後，在人民政權下，他的書就不願再養學校了？

因此，潘序倫走的道路還不僅僅是一般的資本主義道路，

而是要走壟斷資本主義的道路。我們知道，資本主義到了壟斷階段，那是最反動的了，潘序倫所想走的就是這條最反動的壟斷資本主義的道路。潘序倫在解放前就是以偽學者的招牌，向着這條道路起家的。

潘序倫自己說是一個市儈，但是我們認為潘序倫不僅僅是一個市儈，他的用心比一般的市儈要陰險得多；潘序倫自己說是一個剝削大師，但是我們認為潘序倫不僅僅是一個剝削大師，他的手法比一般的資本家要毒辣得多。而且他不僅僅是為了賺錢，而且還有政治野心，想爬上反動政治舞台。他一方面熱中於剝削，另一方面也熱中於政治，這兩者是相輔相成的。因此，他所想要實現的就是壟斷資本的反動統治。潘序倫所以要千方百計和不擇手段地把自己打扮成一個學者，就是想實現他的這個目的。

（俞冠敏）